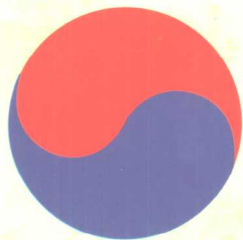


复 旦 大 学 韩 国 研 究 丛 书

韩国研究论丛

(第五辑)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韩国研究论丛

(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韩 国 研 究 论 丛

(第五辑)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55/6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研究论丛/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ISBN 7-5004-2384-5

I. 韩… II. 复… III. 韩国-研究-文集 IV. K3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38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82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6.00 元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韩国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锡昌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石源华(常务)	朴昌根	任 晓
庄锡昌	周明伟	金光耀
黄美真	杨立强	

本辑执行主编：石源华 金光耀

总 序

大约在 100 年以前，韩国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隐士之国”，该国的情况还鲜为世人所知，尤其是西方人士知之甚少。当时，欧美人士只知道这是一个远在地球东端边远地区无比寒冷的国家，那儿居住着一批信仰奇特宗教的神秘的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经过近百年的沧桑，风风雨雨，剧烈变迁，如今的韩国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

回顾韩国人民经历的最近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 50 年是争取国家独立、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民族的奴役，创建民族独立国家的过程；后 50 年是努力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力争使国家与民族踏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过程。

韩国人民用他们的英勇奋斗与艰苦劳动为本民族争得了独立和富强，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赞扬。

韩国与中国是邻邦，又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按理说，中国人民对这么一位邻居应该知之甚多、知之甚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一度被割断了数十年。中韩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最简的限度之内。因此，原本不应该如西方人那样把韩国视为遥远的“隐士之国”的中国人也把韩国视为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度，尤其是今日年轻一代中国人对其了解甚少。

1992 年 8 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双方为对方打开门户以后，中国的“韩国学”、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立即兴起，并且蓬勃发

展。这表明两国人民是多么渴望真切地了解对方。正如久违数十年的两位故旧好友，突然道途重逢。此时他们是惊和喜，询问是否别后无恙；然后则是急切的探悉彼此别后的遭遇与目前的境况。初始的激动心情平静以后还会探讨一下彼此之间是否有可能给予对方什么支持和帮助。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当然不会像朋友之间私交那么简单与朴实，肯定要复杂得多。但是，有一点还是十分相似的，即彼此会急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对方的真情实况。1992年10月，即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两个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了。在这以后复旦大学校内的许多朋友，还有一些校外的朋友，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此以后短短的几年内，围绕韩国问题或与韩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会……还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会议参加者、著作撰稿者都十分踊跃。还有一批年轻朋友来复旦大学做博士生、硕士生，专心研究韩国问题。这一情况出乎我们原先的预料。

再环顾一下周围，可以发现在这短短一段时期国内陆陆续续建立了多处韩国问题研究中心，“韩国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土成长。这正好说明今日中国境内的环境与气氛适合“韩国学”研究的发展。

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韩国学”给予那么多的关注，是有许多理由的，我认为至少有那么几条理由，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韩国学”研究：

其一，韩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生活内容的国家，这是世界上众多文化智慧宝库中的一座，而且有她自己独到之处，人们从这儿可以学习到许多历史文化知识，丰富人类的智慧。

其二，中韩两个民族是相处数千年的近邻，历史上有着密切的交往，从而也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如何科学地、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对于巩固与发展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

颇为重要。

其三，在近代，中韩两个民族还具有一段极其相同的历史遭遇，因而结下了互助互援共同抗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血肉之情。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值得发掘与交流。这是我们两个民族共同的珍贵历史遗产。

其四，中韩两国过去几千年间社会形态、历史演变途径以及近代的历史命运较为类同，然而在最近 30 多年里，韩国率先跨出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步伐，走得又相当成功。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今日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作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借鉴。

其五，为了在两个民族之间建立牢固的友谊，必须彼此充分地理解，而彼此深刻理解的基础就是彼此全面的了解。要了解就必须展开研究。彼此应该深入地研究对方，以求深刻地、全面地了解对方。一言以蔽之，为了两国的友谊，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我们也必须开展韩国学的研究。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

正是从这种种理由出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我们团结了一批朋友，从历史现状的诸多方面展开韩国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丛书的内容涉及韩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以及中韩关系等等方面。现已出版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丛书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怀，也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与好评，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计划一如既往，继续编纂这套丛书。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支持，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庄锡昌

1997 年 10 月 14 日

本书由韩国学术振兴财团支援刊印

目 录

总序	庄锡昌(1)
转型期的韩国政治述论	庄锡昌 杨红梅(1)
韩国统一政策的历史演变	[韩]朴炳光(13)
官僚权威主义与韩国的工业化 ——读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	陈明明(28)
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初析	王文玫(46)
韩国:经合组织中的新面孔	吴勇红(65)
世纪之交的韩印经贸关系:现状与未来	袁传伟 赵鸣歧(72)
韩国 1960—1985 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 移民及模式	[韩]卢熙芳(85)
朝鲜劳动党的宗教观及政策的演变	李春虎(104)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刊

论中国共产党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	石源华(118)
关于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的若干思考	吴景平(128)
论韩国临时政府的五次改宪	杨红梅(140)
论韩国独立党和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 (1940—1945)	石建国(158)
中国济难会与韩国独立	马长林 郑泽青(179)
《尹呈辅先生访问记录》:韩国光复军研究中的 一份值得注意的史料	徐有威(187)

韩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的由来·····	贝民强(194)
韩国临时政府在陪都重庆·····	冯开文(201)
美国外交文件中有关韩国临时政府史料 选编(续)·····	吴景平等(217)

“基督教与近代中韩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刊

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

——一项现代新史学的理论诠释·····	张广智(254)
“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	王春来(265)
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史略·····	顾卫民(285)
中韩基督教本土化问题的比较研究·····	胡晓娣(313)
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 播及其影响·····	邹振环(329)
洪秀全与基督教论纲·····	沈渭滨(346)
孙中山与基督教·····	戴鞍钢(364)
“在土匪魔爪中,亦在上帝手中” ——传教士与民国土匪关系初探(1918—1937)·····	徐有威(369)
战后上海韩人基督教会地位问题的考察·····	石建国 朴英姬(379)
圣约翰大学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	金 燕(384)
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金泽荣·····	邹振环(401)
韩国的金泽荣研究状况·····	[韩]崔惠珠(423)
高宗朝丽蒙关系考述·····	宋晓念(436)
韩国研究中心大事记 (1997年7月至1998年6月)·····	华 磊(460)

(本辑作者除文后注明者外,均系本中心兼任研究员)

转型期的韩国政治论述

庄锡昌 杨红梅

金泳三是韩国经历了 32 年的军人政权统治以后，在 1992 年年底经过全民普选、直接投票而当选的第一位文人总统。在赢得 42% 的选票后，他成为第 14 任韩国总统。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他一直积极投身并领导着韩国的民主运动。因此，当 1993 年 2 月 25 日金泳三宣誓就职之时，确实在韩国人民心中产生了一种“万象更新”的清新感，人们对他很自然地寄予颇高的期望。当时他曾经许诺：建立一个“新韩国”，“根除政府机构和韩国社会其他部门中的腐败现象，振兴国民经济和恢复国民纪律”，等等。^[1]他公布的施政方针即所谓“国政指标”包括：廉洁的政府，扎实的经济，健康的社会，统一的祖国。现在，回顾一下金泳三总统任职近 5 年来韩国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所经历的变化，人们确实可以发现，这是韩国开始走向新政治阶段的转型时期的 5 年。这一阶段中韩国经历的变化的深刻程度，也许是置身其中的人们一时所无法体会与估量的。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 40 多年间，韩国政治因其独裁的特征而常受世人非议。80 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当时，依靠军事政变跻身权力顶峰的韩国第五共和国总统全斗焕企图重演当年朴正熙连任总统的故伎，坚持间接选举总统法，残酷镇压反对

势力，从而激起在野党和全体国民的强烈反对。1987年1月，一名大学生被警察摧残至死引起国民强烈义愤，终于酿成防暴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流血冲突。在此时机，被提名为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的卢泰愚接受反对派的所有要求，于6月29日发表了著名的《民主化宣言》，宣布改革政治，包括直接选举总统，赦免包括金大中在内的政治犯以及实施其他一些民主化措施，从而打破了政治僵局，消除了弥漫于半岛上空的紧张气氛。同年10月，经国民投票通过，韩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九次宪法修改。新宪法增加了保护公民权利、扩大国会权力的条款，缩短总统任期并规定单届任期制，限制总统权力，跨出了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步。^[2]嗣后，在12月，依照新宪法的规定，选举卢泰愚为韩国第13任总统。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主选举、以和平方式完成的政权交接。卢泰愚就任后，在扩大民主、赦免政治犯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的努力，但是总统仍然是一位将军，军方对政治仍然保持了巨大的影响力。

金泳三执政后，韩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发展。首先表现为政府与军队关系的转变。近几十年来，韩国的军事政权常常是依靠政变上台，政府又依靠军人的支持，运用强制力量无情镇压反对派和不同呼声，推行独裁式的专制统治，但是最后又往往被另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这种状况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从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起至1992年韩国最后一届军人政府结束的历届韩国政府之中。军事领导人被任命为主要官员，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渗透到各个领域，因此常引起民众强烈的反抗。1980年5月，因实施军事戒严和金大中被捕，终于酿成举世震惊的光州事件。几十年来，韩国社会一直为这种政治动乱所困扰。直至金泳三总统上任，才采取有效措施使军队逐步走向非政治化。金泳三上任后为光州事件平反；对前军人政府和军人集团所做的很多事件作了重新处理和评价；整肃军队中激进的秘密组织如“一意党”^[3]的成员；在官兵中树立保护民主的意识。这些措

施为制止军人干政，防止重演军人独裁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金泳三另一具有积极意义的行动是实行政党政治的民主化运作。在军人政府时代，少数的军事领导人垄断政权，敌视反对派及作为反对组织的政党，推行以个人为中心的一党独裁。全斗焕就曾于1980年取缔过许多合法政党，禁止许多政治活动家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以至到1985年大选前，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反对党敢于尝试向执政党挑战。而在金泳三政府时期，执政党不再严格限制政治竞争，通向权力之门已向反对党敞开，政党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关系，逐渐演化为竞争关系。传统上执政党历来专横武断，动辄使用武力镇压反对派，反过来这又促使深怀不满的反对派时时处处故意掣肘和极尽中伤诽谤之能事。现在这种状况已大为改观。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在金的前任卢泰愚时代就已开始，但反对党的声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人关注。在1996年4月的第15届国会普选中，执政的新韩国党赢得34.4%的选票，而作为反对党之一的新政治国民会议则取得了25.3%的选票。在国会议席中，新韩国党占得299席中的139席，未过半数，最后靠争取无党派人士的9个席位和民主党3个席位的归附而达到151席的简单多数。为此金大中等反对党人员还指责新韩国党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反对党新政治国民会议占得议席79席，占总数26.4%；自由民主联盟获50席，占16.7%；民主党15席，占5%；此外还有16位独立个人当选。^[4]多党政治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当然，韩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从军人权威政权转向政党文人政权虽是一大进步，但伴随而来的也有政党政治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如前所述，政党与企业之间的权钱交易日益严重。政党竞选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政治家必然要向企业界寻求支持。以往选举活动中向选民行贿的事件也时有所闻，今后如何防止类似现象的出现，同样是棘手的问题。同时，党派竞争的日益激烈，又为地方主义的倾向推波助澜。现有四个主要政党（新韩国

党、新政治国民会议、自由民主联盟、民主党)都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在国会选举中,他们更为重视地方的发展项目,而不是全国性的政策问题。^[5]韩国民众的地域观念历来又是比较浓厚的,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也许会变得更为浓厚。

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曲折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公元4世纪从中国传入儒家思想后,朝鲜半岛就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政治、社会学说中的德政思想、等级观念等等在许多韩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而这类意识是与现代西方式民主观念格格不入的。当年朴正熙曾调侃韩国企图移植美国民主制度的做法:“这就像一个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老道。而韩国就是以1948年时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还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种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6]他认为韩国文化中独裁主义的本性、韩国人的语言、行为举止和社会习俗并不可容忍平等自由的观念。这成为朴正熙推行独裁政治的理论依据。调查资料表明,虽然在韩国成人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太支持某些民主的基本观念,但就总体而言,过去几十年内韩国国民的民主意识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7]韩国近年来此起彼伏要求民主化政治的运动正是有力的事实证据。这无疑金泳三政府推进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基础。广大民众对独裁制度的反思和斗争,使民主化的措施赢得较广泛的支持。今天,这已经不仅仅是金氏本人和其他某些政治活动家的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了,而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金泳三总统作为首届文人政府领袖,是通过民主选举执掌政权的,因此在任期间他有资格坚决清算独裁统治,保障民主道路的畅通。其推进民主的决心,使韩国政治的民主化进入了新的里程。至此,韩国政治经过几十年的动乱和阵痛,终于从总统终身制走向总统单届任期制,从军人政府走向文官政府,从频频依靠军事政变换届过渡到人民直接选举平稳换届,初步实现了向现代政治制度的转型。

几十年来，韩国政府中的贪污渎职现象十分严重，一直是困扰韩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党派无论执政在野，官员无论现任前任，财团无论大小，在人们意识中，整个上层社会几乎都与贪污受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1993年初金泳三上任伊始，表示要“从高层开始全面铲除政府机构渎职和腐败行为”，发起了一场名为“浚源”的反贪污腐败运动。首先，他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公布了自己及其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后又制定了新的《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高级官员必须公开其私人财产状况，把公布个人财产的做法制度化。按照这一法律规定，国务总理黄寅性、监察院长官李会昌、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李经植、副总理兼统一院长官韩完相等24%的内阁各部长官和国家安全企划部长官、汉城特别市市长、检察总长等内阁部长级官员29人，青瓦台秘书室长、警卫室长等高级官员11人，民自党代表委员金钟泌及事务总长崔炯佑等4名高级领导人，民自党国会议员及党务委员161人，内阁次官级人士125人等1167名高级官员，相继公布了个人财产状况，使这一制度得以切实贯彻执行。接着金泳三又以总统特别令的形式宣布实施“金融真名制”，规定任何人实施金融交流活动时必须使用真实姓名，禁止在银行开匿名账户或出售可匿名购买的有价证券、股票和不动产。与此相配套的还有房地产真名制。反腐倡廉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两个月内，民自党成员中，已有包括国会议长朴浚圭在内的6人被免去国会议员资格，受免职处理的有8名次官级官员、3名内阁部长以及汉城特别市市长等；嗣后一年内，共罢免官员1300余名，而至今已经有3000多名政府官员因腐败或其他不轨行为而被免职。特别是金泳三顶住了多方面的压力，借助卢泰愚政治资金案的调查，表明了将反腐倡廉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1995年底，全斗焕和卢泰愚被一起送上了“世纪审判”的被告席，震惊了国内外。同时审判两位前总统，这在本世纪审判史上还是第一次。全斗焕被指控犯有发动政变、贪污腐败等罪行，卢泰愚则在私人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自己在执政期间受贿5000亿韩元（约6.5亿美元）。1996年8月26日，初审分别判处全斗焕、卢泰愚死刑和无期徒刑，一度成为世界舆论瞩目的焦点。1996年11月4日金泳三总统邀请全国市、郡、区地方长官在青瓦台总统府共进午餐时再次重申：“为了斩断腐败的环节，……无论职位高低，绝不给予丝毫宽容”，并且表示“我曾经承诺，就任总统后，不管是谁的钱，一分也不要，这一点将一直坚持到底”。

尽管如此，现任政府高级官员贪污渎职的丑闻依然层出不穷。1996年10月，国防部长官李养镐受贿18.7万美元被揭露，11月，保健部长官李圣浩受贿事件又被曝光；此前，还有一件汉城四名地方官员收受公交公司贿赂的贪污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治政府官员中的腐败未成正果，又屡屡传出政党贪污受贿的新闻。政党与企业之间彼此利用，进行权钱交易，其势依然未减。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反贪污腐败的浪潮竟然还冲击到了金泳三总统的家属甚至总统本人，也令广大民众十分吃惊。此外，政府的全体官员是否已经依法报告了他们的所有财产，这也是一个颇值得怀疑的问题。总之，在金总统即将下任之际，人们感到希望出现一个廉洁政府的期待并没有实现，反对党甚至抨击金泳三的“反腐败运动已告失败”。^[8]

如何根治韩国政府中的腐败现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早在60年代，朴正熙政府就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上台的。他当时也曾力图打击官场腐败行为，所涉及范围不仅包括官商勾结、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任人惟亲等，甚至连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请家庭教师、进行奢侈的文体活动如打高尔夫球等等，也被视为腐败现象予以打击或取缔。^[9]1975年3月，朴正熙政府又发动

了引人注目的“庶政刷新”运动，以期消灭官场腐败和渎职，实现社会净化。当然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产生腐败这一痼疾有很深的历史、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在第三世界并不仅仅是个别国家中存在的问题。然而，韩国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还有其某种特殊的原因。二战后韩国诞生的第一批资产阶级，就是依靠裙带关系获得低价出售的国有企业（原日资企业）而发展起来的。此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外汇、进出口贸易、银行贷款、劳务输出等等又都是受政府管制的，因此企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扶植才能够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军人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的某种联盟，^[10]而前期韩国经济的腾飞正是建立在军人政治和财阀经济这两大基石之上的。军人政府通过高度集权和强制手段，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帮助大财阀得以在政府庇护之下获得快速发展。这种官商勾结的体制在短时期内使韩国能够跻身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同时也埋下了某些隐患。这种做法不仅直接导致了官场的日益腐败，而且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金泳三就任总统的前一年即1992年，制造业部门的增长率已从1988年的13.4%下降到7.4%，出口增长率从1988年的28.4%下降到7.9%，对外贸易也从1989年的盈余45亿美元逆转为49亿美元的赤字，物价涨幅从1984—1987年的2%—3%增至4.5%；到金泳三任总统的1993年时，这一经济滑坡的趋势仍在继续，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前几年的8.4%已下降到4.7%。^[11]有学者指出，由于这种政经勾结的体制，造成了“资源错置”的经济。韩国与亚洲其他“三小龙”相比较，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情况，即韩国的中小企业群成长不足，因此韩国的中小企业无力起到缓和社会冲突等方面的作用。^[12]另外，这种包括政府管制竞争和政府控制资源分配等等做法在内的旧体制也导致投资等方面受到严重局限。^[13]可见，改变陈旧的体制将是根除腐败的关键所在。

但是不管怎么说，金泳三总统曝光和惩治腐败的决心是值得称